

和平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杨鲁慧

(山东大学 亚太研究所, 济南 250100)

摘要:“和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内在特质,是中国履行崛起大国的责任和使命、中国社会制度内在本质的和平属性及对外战略的选择,从而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性质及走向。国际社会正处于发展、变革、调整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是国家制定对外关系的重要考量与基本依据。中国正处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大国从未遇到的复杂国际局面,为此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如何转化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怎样有效地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海洋权益,如何保持与外部世界总体积极和谐的关系,思考未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和转型就成为一种基本逻辑与理论期待。

关键词:和平崛起;国际环境;对外关系;外交战略;变革调整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3)02-0018-05

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处于发展、调整、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各个政治力量角逐调整和战略力量对比较量过程中,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变量。“中国实力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开始进入国际体系核心,也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1]从战略全局上看,内政外交关系一般是衡量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维度。崛起后的大国其对外关系将承受来自各方面种种的压力及困境,面临一系列的国际摩擦与矛盾冲突。伴随经济的崛起,中国也将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摩擦和冲突,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依据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和传统大国崛起的定律,几乎都推论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战争与冲突。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史无前例,并面对比历史上其他崛起大国更加复杂的“崛起困境”。因此,探讨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及理论期待。

一、和平:中国崛起道路的内在本质属性

中国外交经历了若干个历史转折及调整变革,但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有关身份定位的根本问题,即“和平”是中国国家属性的内在特质。“属性是国家的本质规定性,是国家的基本身份。国内属性和

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和选择,进而影响对外政策和行为。”^[2]纵观中国外交60多年的基本经验和实践主题可归纳为:前30年的主题为和平共处,后30年的主题为和平发展,再之后30年的主题为和平崛起。“和平”由此构成中国外交的基本要素,并是一以贯之的基本逻辑。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角色身份责任的履行,固化了国家和平内在本质的属性和对外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制定。“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纪,唯此方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从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而到争取一个合作的外部环境,防止进入一个新的冲突的世纪。”^[3]由此佐证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有根本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的。

和平崛起的本质内涵是“和谐共处”与和平发展,而“软实力”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并是“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其意味着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及“软实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和塑造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形象。“有许多软实力(soft power)也很重要,比如国家构建……国家构建的艺术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决不逊于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4]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及认同感在赋予和平崛起意义的同时,也为崛起进程中的政治行为提供一种软约束。

收稿日期:2013-01-12

作者简介:杨鲁慧(1956—),女,山东济南人,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从事东北亚政治安全和中国周边外交及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为此,“软实力”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石,是实施“和平崛起”外交战略的基础条件。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备受世人关注的代表人物。他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可以以和平方式崛起。在我看来,‘和平崛起’的理念,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5]。在全球化治理时代,约瑟夫·奈依据美国国家利益及权力转移的理论,提出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并着重提出,“软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6]。软权力与硬权力在国际关系领域各有其地位,各自发挥其独特作用。互补性是软权力和硬权力最显著的特点,它们是一个问题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7]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崛起的大国构成不稳定因素,它必然与战争、武力及海外扩张相伴随,成为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者。中国之所以欲通过“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其必然性与可行性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以及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是中国崛起道路中最根本、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基本属性。

第一,“和平性”是中国崛起的本质属性,以发展谋共赢,以合作获利益,以和谐求和平,和平、和谐、和睦处理国家行为体之间及政治集团的关系。中国崛起不是以颠覆或取代其他国家主导地位为目标,它是在国际政治格局的稳定、平和、有序状态下,遵循“游戏规则”逐步进行的,平衡世界格局中的各方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是以相互信任、理解、沟通、协调及和平共处为根本目的,不存在武装暴力和血腥掠夺等激进方式。

第二,“相容性”是和平崛起道路的本质内涵。和平发展涵盖着不同文明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融和相互包容,这恰恰是当下国际政治文化格局所欠缺的。当今的世界文明存在着多样化和多元性及多层次性,不同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多姿多彩、交相辉映,由此构成错综复杂的当代国际关系。包容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文明兼容并蓄,其本身就意味着对不同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的尊重。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交往中,往往存在不同国家文明间的矛盾和差异,这就需要在处理复杂的对外关系中,更多的是依赖对话与协商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靠“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去处理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其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其他国家文明和文化的宽容与

敬重。

第三,“人本性”是和平发展的精髓所在。和平崛起的道路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一种模式选择,无论是作用于经济基础,还是涵盖于上层建筑,其根本都是围绕人这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最终为社会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提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发挥每个公民的潜能和潜质及创新力,为世界的公平、秩序、融合及和谐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服务于人,无疑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根本特性。

二、变革: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环境

国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是国家制定对外关系的重要考量与基本依据。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前10年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中国速度、中国成就、中国崛起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令世人所瞩目。“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外在的影响力是如何达成的,或者说扩展外在影响力的方法。”^[8]“在大国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可能会被其他相对弱小国家的兴衰所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相互依赖往往使各自国家的权力周期发生难以预料和剧烈的变动。”^[9]考察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世界历史上大致发生过三次大国崛起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和调整变局。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崛起。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发展,东方社会的世界重心地位逐步以西方社会取而代之。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居世界霸主地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20世纪成为美国支配和主导的世纪。第三次是21世纪以来亚太新兴经济群体日趋崛起,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军人物,全球范围的多极政治经济格局逐步形成。“新兴大国开始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依附理论所讨论的那种核心—边缘依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0]东亚地区呈现强劲的经济复兴势头,使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转变时期,国际体系处于动荡变革之中。“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在霸权或帝国兴衰的漫长历史中似乎与众不同。它能做到消除种种摩擦,驱散猜疑的阴霾。”^[11]中国走向大国道路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同步的强国之路,在硬软实力转换过程中,我们更注重软实力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及感召力。

综观几百年大国崛起的历史演变,他们都有其

共同点,这就是靠武力战争及海外殖民掠夺来完成他们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经济起飞。“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各国在动用武力上也许会更加慎重,不仅现存强国如此,未来新兴的强国难以仅仅依靠硬实力崛起,21世纪的新生强国应该也必然是软实力大国。”^[3]而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国际环境和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依赖外资引进、国际市场的畅通和接受国外外商和技术创新的方式。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认为: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世界各个国家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和大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作出战略回应,回应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遏制,16世纪的英国在崛起之际曾遭受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遏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双方武力相拼流血战争,但英国的崛起势头仍不可逆转。二是顺势而为、乘势而上,适应并接受大国崛起的现实。20世纪英国接受了美国的崛起,且在世界上保留了许多英国的政治遗产。三是面临大国的崛起不予理会,其后果往往是淘汰出局落伍于时代。光阴荏苒,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再次面对新兴国家崛起的战略选择问题,且已形成两种主流观点:遏制或接受。前者是“零和游戏”规则,结果将是展开一场政治博弈;后者是“非零和”关系,后果是为崛起中的大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提供发展空间。

当今世界,中国已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大国在调整双边关系和对外战略中必然关注的焦点。中国的经济繁荣发展不仅影响着亚洲,而且也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贸易机制与欧美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程度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利益的基础。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西方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它们把中国作为国家外交和发展战略的主要议题。为此,中国所面临的对外环境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及心理预期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政治压力。亚太地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几乎都集中于此。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政治战略重心的调整,全球各大国纷纷把对外战略核心定为中国。近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日本一直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并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长期以来国内军事实力升级和外部战略安排都是以遏制中国为战略目标的。印度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近年来也

加大了“向东看”的对外战略力度,提出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瞄准中国的思路。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大国把中国视为外交和战略重点主要是处于两点考虑:一是在经济上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二是从军事防范和战略遏制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力。可见,国际环境中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将困扰中国的崛起。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政治多极化世界成为必然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成为一支导致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政治力量,国际社会正处于发展、变革、调整的历史转折时期。“对当前国际体系状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本体延续,要素变更。也就是说,一方面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体系单位的整体系统,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几大要素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从以下三点可印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处在大变革时期:

第一,导致国际大变局的主要动因是亚太新兴大国崛起于世界经济舞台,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重组变得不可避免。冷战后东亚地区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崛起,并形成工业化浪潮的“群体传递效应”,环太平洋地区整体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呈现强劲的复兴势头。“进入21世纪,新兴大国群体在同八国集团对话的进程中围绕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与竞争,逐步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12]随着亚太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新的战略中心,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崛起也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当今国际秩序在实力与制度层面的重大变化,是把新兴经济群体往国际舞台的中心推进。”^[13]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必然趋向是相辅相成的,而这种互动关系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再集团化或“G化”,将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力量,中国崛起已经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微妙变化。国际政治重大议题的持续转换,“除了军事冲突、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威胁外,人类日益面临诸如金融危机、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核扩散、能源安全、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14],又一次把全球联手合作、共同治理这些重大议题推向国际政治的理论前沿。在全球合作治理的框架中,以往的国际旧秩序无力承担新形势下的重任,已不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战略诉求,在客观上要求国际秩序必须扩大其国际基础的新兴力量,以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全球政治势力的集团化更为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反

映了 10 年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充分体现了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15]。这就为国际政治权力格局重组提供了转型条件,国际势力的重新集团化及政治力量的配置整合势在必行。

第三,世界各个国家间的利益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碰撞,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调整。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和相互依赖型经济发展,在互动强化和相互塑造时期,不断地培育出国家关系中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平衡,导致他们的行为选择具有很大的趋同性,“非零和”成为国家关系的常态。

三、调整:中国外交适应崛起大势的必然选择

“如果将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与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各种因素纷繁复杂、林林总总,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中国如何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16] 作为一个步入国际事务中心地带的大国,面对不断变革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一个根本性的新命题再次考验着中国外交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信心能力,即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究竟应以何种身份与角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为,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崛起大国相适应的作用和影响力。可见,当一个国家从贫穷落后发展为经济繁荣日趋强大时,他们的外交政策也必然要随着实力的增长而进行调整。“中国的崛起不仅将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走向,更塑造着人类对社会发展模式 and 现代性的理解。”^[17] 为此,我们需要从战略的视角和国家角色定位上进行调整与实现转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型大国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谐的理念、包容的胸怀塑造一个和平与和谐及开放的国际体系。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有新思维、新姿态,尽快推进我国的外交转型。从世界历史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在完成崛起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基本经验:即都能成功地把崛起的经济优势转变为政治和战略优势。那么,当今中国正面临一个和平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遇到的“崛起困境”,这就是在和平与磨合状态下的崛起。它同样面临着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如何转化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怎样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最大化,如何保持与外部世界总体积极和谐的关系,以缓解或减少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来自外部的战略压力。因此,思考未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和转型就成为一种基本逻辑与理论期待。

外交政策事关全局,任何战略的重大调整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不确定后果。对外关系的敏感度

及影响力,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和外部政治压力所决定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不是依赖自身实力提高后傲慢狂妄心态的思维所致,而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内政外交关系始终是考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维度。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选择既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也受到全球大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遏制。体现了内政与外交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构建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崛起大国这一双重身份,就强化了我们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属性,并成为界定国家利益、影响外交政策的根本要素。它要求中国外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总揽外交全局的能力和综合协调的能力。履行这一使命,就需要调整和制定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政治地位相适应的外交总体战略。

第一,全面参与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及海洋权益。以崛起大国身份确立与自身国力相适应的大国战略,遵循对外关系的心态要向大国心态转型,并以统一性的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制定中国对外发展的大战略和新思路。过去的中国外交是以第三世界为角色定位,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中国的外交则是发展大国外交。^[1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绝不是什么麻烦,更不是挑战,而是一支成长中的积极向上的建设性力量。”^[14]同时,中国也无法回避来自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其背后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重大关系发生变革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世界大变局中的利益关系平衡和利益关系的协调,趋利避害,对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及其权力结构趋向作出新的定位判断。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全局利益出发,善于运用大国的战略影响力,既要 对全球性问题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又用保障我国的海洋权益,坦诚表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安全关切。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进程中需要多重战略依托,成为在全球事务中有政治影响力和战略信誉的大国,这就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实施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积极塑造国际战略格局地位与大国间关系的互动态势。培养大国心态,塑造新型大国形象,在大国崛起过程中逐步提高所必需的心理素质和政治掌控能力。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需要一个既是外交大国,也是外交强国的姿态展现。作为一个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且发展模式又与众不同的崛起大国,受到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质疑与打压甚至遏制都是不可避免的。国际社会越是关注中国,就

意味着中国将要承受的外部政治压力越大, 其对中国的期许与中国的竞争是同步的。“在新形势下需要不断深化其时代内涵, 如增加价值观、国际责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内容。”^[19] 确立中国新型大国的角色定位, 需在理念上树立和平大国的形象; 对外关系上呈现自信大国的形象; 价值观上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外交强国是以国际角色的地位和外交上的娴熟技巧为标志的, 唯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刚柔相济才是强国外交的精髓所在, 对不同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 是探索适合中国崛起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第三, 赋予传统外交思路新内涵, 建立一种以内政外交相对独立为前提的新型内政外交关系, 实施中国崛起背景下外交能力向统筹兼顾的战略转型。纵观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的外交战略, 大致可划分为前 30 年与后 30 年及再之后 30 年的阶段分野。从更深的层次看, 它们的共同点和连续性可概括为: 外交是由国内政治属性建构的, 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一直是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前 30 年中国外交中的政治诉求是主体: 求生存维护尊严; 后 30 年外交中的经济诉求是主体: 求发展争取平等; 再之后 30 年的外交中大国崛起诉求是主体: 力求经济政治新型大国的崛起。可见, 国内政治重心的转变重新界定了国家的对外利益, 把内外两个向度的因果逻辑与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处理对外关系, 是中国外交 60 多年坚持的基本原则。全球化打破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严格界定, 国际制度与国家内化的相关性突破了外交与内政的藩篱, 客观上要求国家对外关系的统筹兼顾必然成为基本考量。随着中国的崛起, 外交也要探索自身的行为模式与相对独立的特点, 以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和维护国家利益置于对外关系首要地位。逐步改变既往内政外交相互关系的认知模式, 由外交更多受制于内政向内外平衡和统筹兼顾及良性互构转型, “由过多强调军事忍耐、外交忍耐向全方位维护国家利益转型, 由偏重国内发展战略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加重视国际战略和提升中国大国地位转型”^[2]。这一转型意味着中国如何提升外交能力, 其着眼点在于做好统筹外交的大文章。这就要求我们提高驾驭外交统筹全局的能力, 探索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及统筹能力建设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秦亚青. 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J]. 外交评论: 外交学

院学报, 2010, (1).

- [2] 胡宗山. 新中国外交六十年: 基本经验与未来转型[J]. 社会主义研究, 2009, (5).
- [3] 傅莹. 为什么公共外交那么重要[N]. 环球时报, 2010-09-13(15).
- [4]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 黄胜强,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16.
- [5] 杨晴川. 中国提升“软实力”乃明智之举——专访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N]. 参考消息, 2006-08-10(12).
- [6] 约瑟夫·S. 奈. 硬权力与软实力[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7.
- [7] Cf. Joseph S.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No. 4, 1990.
- [8] [英] 郑永年. 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N]. 联合早报, 2006-06-27.
- [9] Brock F. Tessman and Steve Chan. Source: Power Cycles, Risk Propensity, and Great-Power Deterrenc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2 (Apr, 2004) pp. 132-133.
- [10] James Caporaso,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riphery: The Evolving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in W. L. Hollist and J. Rosnau, eds., *World-System Struc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1981: 140-171.
- [11] [比] 乔纳森·霍尔斯拉格. 中国重塑大国政治吗[N]. 环球时报, 2010-02-26(6).
- [12] 杨洁勉. 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3): 11.
- [13] 蔡拓. 国际秩序的转型与塑造[J]. 外交评论, 2009, (4): 12.
- [14] 乐玉成. 对国际变局与中国外交的若干思考[J]. 现代国际关系, 2012, (8): 2.
- [15] “德媒: 二十国集团十周岁”[N]. 国际财经时报, 2009-12-15.
- [16] 牛军.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序言 2.
- [17] [英] 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 张莉, 刘曲,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导言.
- [18] 张登及. 建构中国: 不确定世界中的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M]. 台北: 扬智出版社, 2003; 张登及. 中国大国外交的类型学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8): 76-80.
- [19] 杨洁勉. 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8): 154.

[责任编辑: 刘建明]